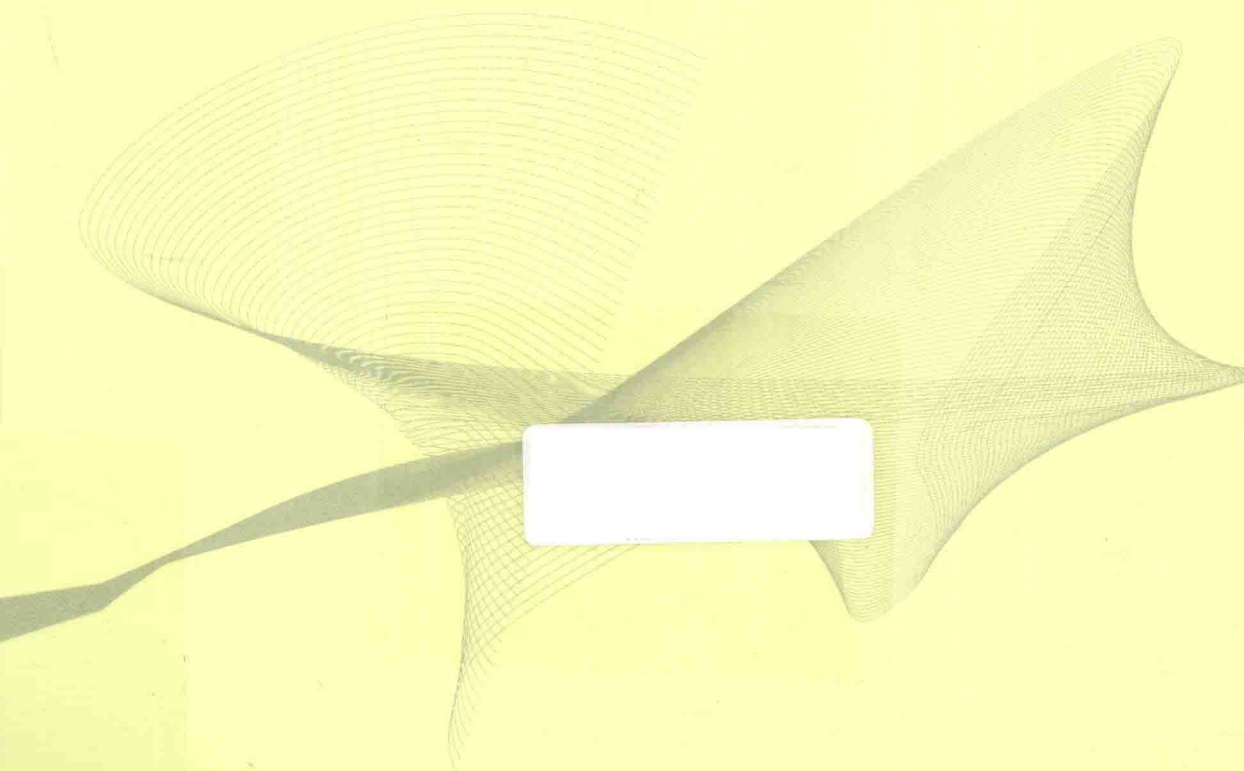


江南都市文化论

JiangNan DuShi WenHua Lun

张兴龙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南都市文化论

JiangNan DuShi WenHua Lun

张兴龙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都市文化论 / 张兴龙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12-4818-3

I. ①江… II. ①张… III. ①城市文化—文化史—研究—
华东地区 IV. ①G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7110 号

江南都市文化论

著 者: 张兴龙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6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4818-3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都市文化学科构建的意义（代序）

都市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极其复杂和广阔，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了解。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任何一个城市都是物质性的建筑实体和精神性的文化历史积淀的双重组合。前者包括了经过长期经营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格局、宫殿、寺观、府第、园林、街道、民居等物质环境或体形环境，这些是城市存在的物质现实基础和空间结构，是人们对城市得以感官化、形象化的逻辑前提。后者包括了城市物质环境负载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部蕴涵，它们是城市存在的非物质性的人文基础和历史结构，是为建筑物灌注“生气”和“理念”的“城市的灵魂”。以如此复杂的城市结构为研究对象，是导致都市文化研究出现多重视野的原因之一。其次，从研究主体方面看，任何研究者都存在着一个认识视角选取的问题，正如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说：“时间的一切认识，包括人的认识，都是一种特定的视角，借助这种视角，人发现他的状况的范围。”^① 尤其是在面对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都市文化时，由于研究者自身在知识结构、情感体验、趣味价值等方面的差异，在他们的实际研究中也必然要出现多元性的方法与价值。就当下而言，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人类学、艺术学、区域文化学等学科，都对都市文化问题有所涉及，并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多元化、多维度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研究视野具有很大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们以各自的理论与方法丰富了都市文化研究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又由于它们相互之间

^①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的矛盾与冲突而干扰了都市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同时，对这些与都市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话语与学术经验进行正确的梳理与评价，本身也是吸取其精华、推动它们在都市文化框架下实现更高层次统一的理论任务。

但是，面对迅猛发展的都市文化这一“事实”，任何一种对事实的观念都面临着被重新解构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当前都市文化研究中的视角多元化格局现状，固然有利于对都市文化进行“多元解读”，从而更好地拓展、延伸都市文化知识状况，然而，一方面，他们大多局限于从各自的角度，相对狭隘地探讨问题，虽然在各自的视角语境下不乏真理的意义，但从整个都市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要求上来看，它们往往成为“片面的真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知识结构，都市文化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相对更加科学客观、严密精细的学科体系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因此，都市文化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都市文化学科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都市文化学科的建设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都市社会结构，明确都市发展的理想目标，适应了构建和谐都市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

“有什么样的话语，就有什么样的本体。”对于中国都市文化研究来说，则是有什么样的都市文化理论和框架，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都市文化，并直接决定了都市文化学术生产的最终结果。一旦失去了都市文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规范，都市社会往往成为各种理论视野和学术话语的演练场，其固然为我们展示了都市社会的种种面孔，同时，更恶化了对都市社会结构状态和文化内涵的理性认识。只有把都市文化学科完全建立起来，我们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认识都市社会结构，从而明确都市发展的理想目标在于何处。尤其在都市化进程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促进都市自身和谐发展以及构建都市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潮流，而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促进和建设都市文化研究理论的学科体系。

其次，都市文化学科建设有助于指引和推动中国都市化进程，为中国都市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路径，在中国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由于历史上世界都市化进程的主体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对于工业化时代的都

市问题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经验应对,而当下都市化的主流已经转移到中国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此需要重新面对完全不同的都市社会问题,急需关于都市发展的科学理论成果,为都市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另外,与西方发达国家都市问题和矛盾急剧尖锐引发的学术理论关注相比,建立科学的都市文化研究学科体系不仅仅可以有效地避免中国都市发展重复西方的老路子,也可以为中国都市化进程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建立都市文化研究学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面对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与城市危机,传统学科已经无力承担起科学解决的任务,为此必须建立新的都市文化学科体系。

虽然都市化和都市问题早在都市出现的时候就伴随而来,并且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爆发过,也正是因为这个现实问题直接促进和催生了学界对于都市的关注和理论发展。但是,由于上述研究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都市文化学科的基础上,只是从不同的学科中审视都市问题,或者提出解决方案,因此,这些都可以被最终归纳为一种都市的视角。随着社会发展,都市问题的出现愈发频繁,而都市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愈发尖锐,旧的传统学科或都市视角显然无力承担起解决的重大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学科建设无疑是社会都市现状决定的。

其次,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大量的现实问题,不仅需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而且更需要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以中国都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门类,换言之,世界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都市问题特殊性决定了加快都市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现实意义。

就中国都市化进程来说,一方面被世界都市共同面对的问题所困扰,诸如都市人口膨胀、交通污染等等,另一方面,中国都市问题又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即快速的都市增长和各种都市的不平衡发展,对此,学界早有人指出,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便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内部,中心城区的发展与其郊区的城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不仅与都市化进程内部固有的弊端相关,而且与中国经济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相连。在这个情况下,不仅西

方都市理论框架无法解决这些难题，而且，中国传统都市研究理论也面临着重新洗牌整合的考验，而具备中国都市问题意识，掌握都市发展规律，应对都市问题和危机的前提则是尽快实现都市文化学科的建立。

再次，都市在人类文明历史和现状中的突出地位，是都市文化学科建设的另一重要现实基础。

法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到，逐渐自乡村的最终破产之中脱颖而出的城市，实在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遵行的历程和意义，我们便根本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① 这种“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的观念，虽然往往陷入人类文明城市中心论的泥潭，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同时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城市成为了文明的核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此，理查德·李翰指出，“近三百年来，城市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命运——它也与个人和民族的命运不可分。”^② 在这个意义上，对都市的关注代表了对人类文明发展核心问题的把握。反之，各种都市问题以及都市文化发展的困惑、质疑和分歧也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因此，对都市文化学科建设的积极推进，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现状的关注和实践。

那么，都市文化学科应该如何建构呢？在我们看来，至少对如下两个方面加以特别关注：

首先，都市文化学科应当达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实证性与反思性的统一，价值评判与审美判断的统一。其关键在于以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与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早已存在的各种障碍。都市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让对都市的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融通在一起。而且，这两种对都市的研究视野从根本上是相通相融的，二者的结合点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都可以落实到“都市”上，而且还因为，无论是社

① [德] 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3 页。

② 参见刘士林主编：《2007 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9 页。

会科学研究还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在落实到都市研究时,都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只不过前者间接一些,而后者直接一些,前者为后者提供材料,后者对前者进行阐发;前者研究都市的直接现实,后者研究这一现实带来的精神性的与情感性的后果。所以,都市文化研究必须把二者综合起来,应用一种综合性的、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借助于二者所能够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求得对都市文化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研究,吸收社会学的方法走向实证,吸收大众文化的结论进行批判,吸收审美研究的方法把握时尚与都市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吸收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的结果而为都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文化规划。一方面它是一门人文学科,要承担反思与批判的任务,另一方面这种反思必须建立在对对象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必须借助于城市学的知识性与社会学的实证性。所以,都市文化研究展开为人文学科,而根子却扎在城市研究与社会研究这些社会科学的基础之上。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视野所具有的双重性构成了都市文化研究在研究视野上的开放性与综合性和历史性。

其次,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性思维。^①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民族要站在都市发展的最前沿,也不能离开理性而严谨的学科理论思考。但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对象的极其复杂性,以及它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缠绕交叉的纠葛问题,这个学科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为此,需要为都市文化研究建立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在我们看来,这个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在于从人的内在生产观念上寻觅。

任何文化的创造都将归结于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对此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研究和追索,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活动,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内在生产观念”,而人类是按照观念来活动和生产的。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人与动物不同,就在于他不仅“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就前者而言,因为人和动物一样都生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都要依靠物质生活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后者而言,人并不像动物那样仅仅维持生命本身的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4页。

更要考虑到怎么存在更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因为人比动物独有的“思维到自身”的本领驱使着人类不仅建造出城市基础建筑设施，以此满足人的“感觉到自身”的受动性，而且，把更多的聪明智慧运用到如何把城市设计的更为漂亮，以及如何让城市更好地成为人类生活的理想和归宿地。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更为彻底和明确，在他看来，作为动物存在的蜘蛛的活动与作为社会主体的织工的活动虽然看起来相似，甚至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在建筑上比动物高明的地方，或者说人和动物建筑的根本区别显然并不仅仅限于建筑设施本身，而是对于建筑的理念上是否具有主动的积极能动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可以“思维自身”的内在生产观念，人类才实现了都市建设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动物性的遮风避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而是把艺术设计融入建筑里面，从而创作出所谓的“花园城市”等等，而都市文化研究则对于如何阐释和追索人类在城市发展中的“内在生产观念”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术发展史上都市文化研究的多重视野既为当下都市化进程和都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加深了都市理论研究和现实之间日渐凸显的矛盾。这一方面推动了都市文化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也对于我们如何研究都市文化提出了崭新的难题。而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催促学科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与都市文化精神的生成，是都市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命题，历史上杭州和扬州都市文化原始形态，是切入江南都市文化深层结构的重要路径，以“诗性——审美”的视角透视古代江南都市文化，开拓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空间，澄明江南都市文化的基本理念和现实经验，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理想和目标。虽不能至，心仍向往之！是为序。

张兴龙

2013年3月10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2页。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	1
一、“江南文化之源”与江南都市文化精神的生成	/ 1
二、吴文化	/ 12
三、越文化	/ 21
四、海派文化	/ 27
第二章 江南文化的区域界定及诗性精神	35
一、江南文化的核心区	/ 35
二、江南文化的审美维度	/ 38
三、江南文化的宗教维度	/ 44
第三章 江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	49
一、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	/ 49
二、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	/ 60
三、江南文化与荆楚、巴蜀、岭南文化	/ 66
第四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南回归线”	76
一、古代杭州的自然地理	/ 76
二、古代杭州的人口种族	/ 82
三、古代杭州都市文化的起源与形态	/ 96

第五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北回归线”	108
一、古代扬州的自然地理	/ 108
二、古代扬州的人口种族	/ 115
三、古代扬州都市文化的原始形态	/ 121
第六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127
一、从江南之江南到世界之江南	/ 127
二、长三角都市群文化现代性转换	/ 140
第七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青春记忆	155
一、苏州：城市园林的诗画境界	/ 155
二、杭州：聚焦南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东南大都”	/ 159
三、上海：大上海的江南文脉	/ 180
四、南京：从十里秦淮看南京的三张面孔	/ 185
五、扬州：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空间	/ 192
后 记	212

第一章

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

一、“江南文化之源”与江南都市文化精神的生成

(一) 江南文化之源

江南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学界对此一直有分歧，造成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江南地理区域界定上的差异，既然江南区域范围存在争议，文化源头当然无法统一。张光直先生在谈到古史研究时说，“我认为要时常想想下面几个单词：What, Where, When, How, Why, 即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和为什么。”^① 这对于江南文化之源研究同样具有直接的方法论意义，即首先需要在区域地理上对“江南”一词作必要的界定。本书第二章将专门阐释江南区域问题，所以此处不再赘述。简言之，本文中的江南指的是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太仓等八府一州所组成的地区，即以今天的苏州太湖流域为核心区，但其辐射区并不仅仅限于太湖流域，而是向南进入闽北，向北达到扬州。在确定了江南文化的区域之后，对“江南文化”基本特质进行界定，则是研究“江南文化之源”的另一个基本语境。

一方面，虽然提起江南文化，人人都能说出一大堆的“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但是，如果追问究竟什么是江南文化，往往不知从何说起。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澄清，就无法对江南文化的源头进行追溯。另一方面，如果以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为标志划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今天已

^① [美] 张光直著，刘士林编：《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

经进入中国都市化进程最发达层面的江南，其区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以及深层精神结构，都经历过人类文明三次“沧海变桑田”的洗涤，而对江南文化历史源头的探寻，不仅体现在借助现代最先进的考古学技术，对江南文化“物质的遗存”的原始形态加以辨析，还需要对江南文化“精神的遗存”的“元结构”加以透视，只有确定了江南文化的基本形态之后，才有可能以此为参照标尺对其源头进行历史追溯。

本文认为，“江南文化”的基本特质来自其最深层的精神结构，此后所有的江南文化特征都是在这个“元结构”基础上生发的，学者刘士林曾经指出，与“伦理——政治”为深层精神结构的北方文化完全不同，江南文化精神的“元结构”在于“审美——艺术”，由此生成了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它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①这不仅把江南文化与柔媚秀丽的“表象江南”、“现象江南”区别开来，同时，也与同为长江文明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划清了界限。本文探寻江南文化的源头，就是对江南核心区内这种“审美——艺术”精神“元结构”发生期的探索。在澄明了这个基本语境之后，对于“江南文化之源”的研究，就可以从沿着表层地理区域和深层精神结构两个向度展开，以此求得真正意义上的切近“江南文化之源”的本质，从而真正为中国江南文化找到回乡之路。

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每一个民族文明时代的精神起点都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区间”，这对于研究江南文化源头的重要启示意义在于，“江南文化之源”的“历史区间”，一定是从根本上影响着江南文化发展进程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意味着江南文化的源头既不等于于粗糙的原始物质文明，也有别于那些无法占据江南文化主流形态的边缘精神文明。当前学界有人认为“三山文化”或“河姆渡文化”是“江南文化之源”，就与忽视这两个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先说“三山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学成果来看，苏州有人类生息的历

①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9 页。

史，最早可上溯到太湖三山岛距今已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三山文化”，这是1985年在吴县三山岛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的考古学者认为，“三山文化”就是江南文化的源头，其“物质的遗存”便是证明。其实，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学理性缺陷，一方面，“三山文化”在空间地域层面上，能否代表江南核心区域对整个江南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在精神结构层面上，能否对江南文化主流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而且，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以及江南文明发展水平而言，旧石器时代的江南文化形态是相当低下和粗糙的，照此推算，“三山文化”不可能产生主导江南文化形态的作用。而如果不能对江南文化核心区以及主流文化形态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就意味着“三山文化”只能是江南的边缘文化形态，也就不具备“江南文化之源”的逻辑基础。另一方面，就“三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而言，由于历史的久远，文化的具体特征已经很难加以全面而深入的辨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江南文化历史发生期的界定，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发掘作为对象，而不是残缺不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因此，“三山文化”不可能成为“江南文化之源”。

再说余姚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距今7000年前栽培的水稻，迄今为止最早的木结构水井，最早的漆器制品，而享有“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的美誉，有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文明一元论的传统观念，让江南文明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摇篮的位置。河姆渡文化打破了中华文明源自黄河文明一元论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以此代表整个江南文化，则未免过于片面。

首先，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在太湖流域，而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地理位置，并不处于太湖流域的核心区域，如果从江南文化核心区域辐射和传承的角度而言，河姆渡文化固然对太湖流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是，至少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考古成果证实，它曾对整个江南区域文化发生过本质的影响。

其次，据今天的考古学发现，河姆渡文化虽然拥有丰富的原始艺术，例如陶、骨、象牙、玉石等，但是在艺术风格总体上是“写实而朴素”的。这正是一切原始艺术的共同特征。因此，从独立特征并不明显的、作

为整个江南文明起源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寻找本文语境下的江南文化起点，这与从包容性极强的整个中国文明中寻找起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比起其他非太湖流域的文化遗址，其更接近江南文化传统的起点，但是，由于和后来传统延续上的差异性太大，因而无法将其纳入江南文化传统起点的视野内。

再次，也是最重要一点是，文化的起源绝不简单等同于人类文明发生的起点，文化起点的核心在于冯天瑜先生所说的“元典精神”，既具有生产时间上的首创性，又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还具有文化认同上的同质性，这是判断和确定江南文化源头最为关键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探寻江南文化之源并不等于纯粹的文明发生时间的追溯，而是需要通过物态化的文化历史遗留物的挖掘，揭示其对于后天文化传承在深层精神结构上的血脉联系。换言之，江南文化之源对于后来文化精神，在历时态上，具有延续性和反复性；在共时态上，具有普遍性、渗透性。河姆渡文化虽然产生的时间很早，并且拥有丰富的“历史遗留物”，如陶、骨、象牙、玉石等，但在深层精神结构上并不具备江南文化“元典精神”的特质，无法担当起江南文化核心元素的重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同许多学者提出的江南文化的源头在余姚的河姆渡文化。

本文认为，江南文化之源是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遗址位于嘉兴西南7.5公里的城南马家浜，面积约1.5万平方米。它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上承余姚河姆渡文化，下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距今天约7000~6000年。20世纪50年代，在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出土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等“特征鲜明，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在浙江吴兴邱城、江苏吴江梅堰也发现了相同内涵的文化遗址。197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和其他考古学家，根据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近的考古成果，提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这一划时代的论点，并且确认了以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此后，马家浜文化被正式定名。

把马家浜文化认定为“江南文化之源”，其学理性依据在于：首先，

稻作要素被认为确定江南史前文化的重要标志。而据已经发现的考古学成果来看,长江流域共发现了20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其中很多含有稻作要素,但是在年限上,马家浜文化遗址最早,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年限。为此,载入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其次,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化特性对于江南地区具有更强大辐射性和认同性。考古学成果表明,马家浜文化有一个很大的辐射范围,其遗址遍布杭嘉湖地区以及整个江南的苏、锡、常、沪。例如嘉兴马家浜、千家埭、钟家港;桐乡的罗家角、谭家湾、新桥、吴家墙门;海宁的郭家石桥、坟桥港;海盐的彭城;平湖的大坟塘;嘉善的小横港、大往遗址;湖州的邱城;杭州的吴家埠;苏州的越城;吴县的草鞋山;吴江的袁家埭;上海的青浦崧泽;常州的圩墩;武进的潘家塘等。嘉兴的马家浜遗址发现最早,处在这个广阔的中心地带。环太湖地区人类活动圈出现了极为相似的文化共同体。而这些区域都以马家浜文化为源头,经过数千年传播、交融,终于形成了太湖流域的古代文化,并发展为今天的江南文化。以马家浜文化作为江南文化之源,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确定了马家浜文化为江南文化之源,对于江南都市文化精神的生成,除了稻作要素之外,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马家浜文化中女性地位变化问题。考古学发现,马家浜文化发展到崧泽文化这一阶段,女性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且社会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象征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器物。这个问题往往被学界简单理解为母系社会妇女特殊社会地位的表现。其实不然,一方面,北方文化源头时期也经历过母系社会,但为什么文化精神上与江南文化的女性特征相去甚远呢?除了地理、气候、人种等客观因素上的差异,还应该和江南文化源头时期女性地位突出相关。另一方面,江南文化之源中的女性突出地位直接关涉到人类心灵深处精神结构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由于此时人类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智慧”,原始先民对母性生殖崇拜的敬畏尊崇,以及母权制度下宽松温和社会的心理认同,历经积淀凝结成江南文化精神上的阴柔宽厚、儒雅精致的女性品格。借用荣格精神心理学的话来说,则是江南文化精神形成中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种族的记忆”,当外在社会环境过于压抑的时候,江南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创伤”或者“记忆”往往更容易被激活

而“原型再现”。江南文化精神形成“江南轴心期”的魏晋，以及江南文化精神生产最成熟形态的明清，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压迫最为黑暗的时代，也是江南文化精神中女性品格最灿烂的时期，如果没有文化源头上心理精神结构因素的影响，单纯的地理、环境、种族等因素就无法解释清楚。

二是环太湖文化一脉相承而其源头在马家浜的“历史遗留物”问题。就文化性质来说，宁镇、太湖和江苏境内江淮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应该属于同一文化系统。^① 环太湖文化内在延续的重要历史遗留物之一就是温润华美的玉器。玉器是人类思维和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蕴涵着精神、道德和智慧的内涵。玉器又以良渚文化时期最为著名。“良渚文化距今 5300~4100 年。这一千多年间，长江下游的玉器文化突飞猛进，达到中国、世界玉器文化之顶峰。”^② 琢玉工业相当发达。在地理区域上，良渚文化分部在长江三角洲平原，南至浙江杭州湾，北达江苏北部，西到南京附近，中心在太湖平原及其邻近地区。^③ 其范围与马家浜文化辐射区以及今天的江南区域都极其吻合。考古学界早已证明，良渚文化的源头来自于马家浜文化。王明达先生则认为，每个马家浜文化的墓地中都有一定数量的精美玉块出土，总数相对可观，在太平洋西岸玉块的分布、传播线路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家浜文化遗址中的玉器，“磨制精美，光素无纹”，既是原始信仰中先民对灵物或某种自然崇拜的物化写照，揭开了中华七千年玉文化的序幕。同时，也体现了江南文化特有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狰狞、冷漠的北方青铜文明的文化品质，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认为，它是温和、玲珑剔透、娇小的文明，温润、小巧、亲切，是只属于江南的中华文明的另一种形态。一方面，江南文化早期遗址都发掘过大量的玉器，由此造就了江南地理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与其他文明遗址中的玉器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完全来自于地质学

① 杨楠编：《考古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4 页。

② 宁可主编：《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董楚平、金永平等撰《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 页。

③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5 期。